

第十三届亚洲艺术节在昆明开幕

新华社昆明11月18日电(记者 徐砾 周洪鹏) 由文化部、云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,云南省文化厅、昆明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第十三届亚洲艺术节18日在昆明开幕。

本届亚洲艺术节以“魅力亚洲、文化中国、七彩云南、美丽春城”为主题。应中国文化部邀请,柬埔寨、印尼、新加坡、越南、斯里兰卡、尼泊尔、朝鲜等11个亚洲国家组派了艺术团出席本届艺术节活动。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、相关国际组织的嘉宾和代表,相关国家驻华使节等应邀出席艺术节期间举办的论坛、展览等主要活动。

艺术节主体活动包括5大板块7项内容:一个仪式(开幕式演出)、一项展演(舞台艺术展演)、一系列巡演(亚洲艺术家“走进人民”巡演)、两个论坛(首届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、第二届亚洲文化论坛)、两个展览(“四海一家”驻华使馆馆藏精品展、朝鲜艺术家油画精品展)。

据主办方介绍,本届艺术节具有国际性、艺术性、人民性、民族性、俭约性等特点,遵循“节俭、务实”的要求,在原定方案的基础上,时间压缩了2/3,内容减少了1/3,规模压缩了2/3,经费压缩了3/4,取消闭幕式等,使本届艺术节更具特色。

亚洲艺术节是经国务院批准的我国唯一的区域性国际艺术节。自1998年首次在北京举办以来,先后在浙江杭州、吉林长春、江苏南通、河南郑州、内蒙古鄂尔多斯、重庆等地举办了12届,来自亚洲26个国家的近300个艺术团队以及近千万各地群众参与其中。

批评家要有关注现实的热情与自觉

□本报记者 黄尚恩

如何切实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,是作家、评论家们一直在关注的问题。近日在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上,来自全国各地的70多位评论家(以青年评论家为主)围绕“新视野中的当代文艺批评”、“文艺前沿与未来生长点”等议题展开讨论。大家认为,文艺批评是针对具体的作品进行言说,但在选择切入评论的角度时,必须呼应现实社会存在的命题,让文艺批评与现实生活发生共振。

“呼应”、“反映”现实生活,一般是我们对作家创作提出的一种期望。将这种期望带到文艺批评当中,其必要性和意义何在?评论家陈福民谈到,他参加一些杂志的论文评奖或者一些高校的研究课题评审时,看到很多文章都是在重复论述一些“死知识”。这些一般知识的“重复轮回”,耗费了无数青年宝贵的时间和生命。这些文章与现实社会没有任何关联,跟批评者的主体情怀也关系不大。读者读了,也许会觉得文章写得不错,但却“没有什么用”。这样的情况,就迫使评论家真正从现实生活中获得一种问题意识,让自己的文章与当下中国的复杂现实相契合。或者说,批评的有效性是从问题的有效性开始的。

谈到文艺批评该如何与社会现实更紧密地结合,有些与会者提出,评论家不应该就文学来谈文学,应该在更广阔的语境中对作品进行分析。青年评论家霍炬谈到,要把中国复杂的现实,评论家要抛弃那种狭隘的“文艺”概念,不仅要关注文学,还要汲取其他艺术门类的成果。社会的发展会导致众多领域出现一些共通性的表现,只有尽可能都把握好了,我们才可能更好地讲述“中国的经验”。青年评论家何吉贤也认为,如果将我们的视野仅限于文艺领域,是很难做出有效的文艺批评的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文艺、放弃对作品的细读,而是说我们要积极参与到整个思想界的讨论当中。这需要作家的努力创作和评论家的积极参与。

很多与会者谈到,当前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,演绎着一个又一个“中国故事”。现在文艺作品所表现出的问题,原有的理论框架已经分析不了。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,如果评论家按照原有的阐释框架对作品进行分析,这个批评肯定是失效的。新的问题需要新的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。对于这个问题,评论家张颐武说,在上世纪80年代,批评者学了一些新的理论,就直接拿来对作品进行分析。但现在,面对新的中国经验、中国故事,我们只能去创建一种超越传统的理论框架。当然,我们可以继续学习西方的一系列理论,可以到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中寻找资源。但最重要的是,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现实,寻找适合当下现实的批评声音。

这样看来,努力把现实状况和寻找新的理论框架就变成了应该并行的两件事。与会者谈到,对于文艺评论家来说,这二者都应该结合具体的文艺作品来完成。评论家们必须思考,作家创作的作品中所反映的现实是什么样的,它和评论者自身通过多个维度获得的对现实的认知有何异同,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整合和摸索出适合现实、契合作品的批评话语。但这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。评论家邵燕君谈到,她指导的一些硕士生对网络文学、大众文化非常熟悉,但他们可能找不到现成的理论资源进行分析。要让他们一下子就把握好作品与现实的关系,又要整合一套新的理论,这是不大可能的。如果他们“不是那么学术”地将感悟写出来,我们能够给予支持并发表,那么这会有助于年轻的评论者涌现出来。

要获得崭新的理论框架,需要评论家对中国现实和创作情况都具有清晰的判断。评论家该如何获得这种判断,判断的立足点来自哪里?对此,评论家刘复生提出,评论家对社会生活要有一种“远景”,才能对当下的生活进行判断。在他看来,支持文学写作的深层动力之一是作家所崇尚的某种社会理想。所谓“社会理想”,简单地说就是对“何为好生活”的判断,就是一种远景。有了远景,评论家才能对现实生活进行总体评价,才能更好地理解个体的生活。在此基础上,评论家才能找到

适合时代的文学形式以及讲述现实的方法。所谓“阐释中国”的焦虑,其实就是因为“没有远景”、“没有总体化”,以至于找不到讲述中国故事的角度和方法。因此,“我们要重新再出发,重新建立一个尽管微弱但仍会有力量的一种远景”。

刘复生提出关于远景的观点,得到与会评论家的积极回应。有与会者认为,面对复杂多元的社会和文学现状,想要提炼出一个远景,难度实在太大。而且,用远景来观察当下,是一种武断的做法,它会淹没当下的复杂性。但是,如同大家都热衷于建构一种新的批评话语体系一样,更多的与会者也认同这种关于远景的说法。很多人还谈到,远景不应当是永远到达不了的“彼岸”,而应是一种有实现可能性的美好期盼。“远景并不是凭空造出来的,它应该扎根于现实的土壤。”然而,随着与会者对问题的深入讨论,到底是“先有远景才能对现实进行清晰判断”,还是“先对现实有完整认知,才能建构所谓的远景”,似乎就变成了一个无解的悖论。

在本届论坛上,与会的评论家们还结合许多文艺作品分析了“青春叙事”的问题,并对当前颇受关注的“非虚构写作”进行了讨论。

此次活动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主办。据相关负责人介绍,该论坛将每年举办一次,为青年评论家的发展提供平台。

《蒋子龙文集》在天津首发

本报讯(记者 余义林) 近日,由天津市作协主办的《蒋子龙文集》新书发布会在天津举行。蒋子龙、赵汝、万镜明、夏康达、闫立飞、包兰英等参加了发布会。蒋子龙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,197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《机电局长的一天》为文坛所瞩目,197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《乔厂长上任记》成为我国工业题材改革文学的代表作之一。蒋子龙的作品厚重大气,语言精辟,哲理性强。他以一个作家和思想家的身份,在不同时期、不同年代都为我国当代文学奉献出了经典佳作,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久远的影响,也让人们记住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。他不仅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,其作品也被译成英、法、俄、德、意、葡等10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期出版的《蒋子龙文集》共计14卷、640万字,是蒋子龙50多年文学创作成果的集成和精华。作者不仅亲自编选了每一卷的内容,还在每卷的卷首写下了精彩的说明文字,介绍了创作时的相关背景。整部文集分为长篇小说、中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不同体裁,既包括了蒋子龙的代表作和国内外获奖作品,也收录了其散见于报刊的各类文章。与会者认为,《蒋子龙文集》的出版发行,是我国文坛上的一件大事。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,重读以《乔厂长上任记》为代表的“改革文学”,对当代文学创作和作家在新形势下进一步贴近时代、贴近生活,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。

开拓和挖掘 军事题材的崭新视角

本报讯(记者 王觅) 11月16日,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《滴血的乳汁》研讨会在京举行。此次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和作家出版社联合主办。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出席。

上世纪30年代,红军先后撤离瑞金等苏区,迫于形势,无论革命领袖还是红军战士都无法带年幼的孩子一起转移。这些孩子只得留下并更名换姓,寄养在当地老乡家里。红军撤离后,国民党军队进入苏区,他们开始疯狂搜查与残害红军留下的孩子。为了保护这些年幼的孩子,当地百姓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。虽然大多是普通人,但他们身上却体现出高贵的精神。尤其是那些保护并哺育了孩子们的“奶妈”,满怀对红军的深情和对共产党人的敬意,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。青年军旅报告文学女作家马娜关注到这一题材。通过深入老区进行采访、挖掘素材,她创作了报告文学作品《滴血的乳汁》,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

与会者认为,与大多数革命战争题材作品将视角直接对准战场、军队和军人不同,《滴血的乳汁》所切入的角度是战场背后的故事,关注的人物是那些以自己的乳汁甚至生命哺育、保护与拯救红军遗留在苏区子女们的“奶妈”,开拓和挖掘了军事文学题材的崭新视角,为军事文学书写注入了生机活力。作者通过艺术而真实的讲述,还原和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,使“红军奶妈”群像生动传神、呼之欲出。而那些从尘封历史中打捞出的不该被遗忘的细节,使人在发自内心感动的同时,也触摸到了历史的真实和厚度。

儿童应该有自己的电影院

□高小立

近年来,随着商业主流影片的强势公映,观众对推出差异化院线的呼声越来越高,其中更多聚焦在对建立艺术影院的呼吁上。为此,为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,一些院线的确推出了专门的艺术影院,遗憾的是观众基本上不知晓,艺术影院推出数日或坚持满月后,纷纷因为票房不佳而“关门大吉”,恢复了商业片的放映。究其原因,一是宣传不到位,大多数观众根本不知道有专门的艺术影院;二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,开了几天,还不曾热身,见没多少人光顾,就想当然地认为没观众;三是片源确实有限。由于电影产业化的明确定位,专门拍摄艺术片的电影人越来越少,即使不甘心放弃艺术追求的导演,也在力图创作艺术与商业结合的影片,且相当一批导演在走这条路。比如今年获得票房佳绩的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《中国合伙人》《全城追击》等一批中小成本影片,都给商业片增加了更多的艺术含量。所以现在没有更多的片源供专门的艺术院线放映。

现在中国银幕数每天都有增长,那么建立差异化影院的需求究竟在哪里?笔者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“儿童电影论坛”上,提出目前最应该建立的差异化影院是给孩子电影专门设立的影院。这一建议得到了与会院线方的支持与响应,他们看到了建立差异化影院的前景。

不包括动画片,中国每年生产50部左右的儿童故事电影。去年,中国电影的总产量是745部,这50部儿童电影基本上被淹没在745部中,如果再加上档期和排片时间的不公平,有多少人知道还有50部专门给孩子观看的影片?试想,万达集团旗下的每个院线都多达八九个影厅,如果拿出一个厅作为固定放映儿童电影的影院,那就既能保证每部儿童影片的顺利放映,又满足了孩子们的观影需求。

从创作角度说,儿童影院的专门设立,还可能激发更多的电影出品人和电影创作者投身儿童电影的创作,他们可以不再为影片拍出来能否公映、何时排片与什么时间段放映而烦恼。有了大批爱孩子的电影人,有了专门放映儿童片的场地,每年的儿童电影就可能远远不止50部了。再加上动画片、国外引进片,片源也就不成问题了。

从观影者看,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家长,我想带孩子看电影,现在有什么儿童电影?哪家影院在放映?排在什么时间段?我肯定是一头雾水。但如果每个城市能有一两个专门放映儿童电影的影院,家长随时可以带着孩子去影院。每周的双休日或每年的寒暑假,孩子们除了看电视、电脑前的单调生活,看几场电影应该再不是问题了。家长不用盲目地查询哪里在放儿童电影,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孩子直奔儿童影院。长期下来,不仅孩子们得到了观影满足,还能培养一大批中老年观众走进影院,改变目前中国电影观众日渐老龄化的现状,无疑为中国的电影市场开拓了新的观众群。

从院线方来讲,这也是对中国院线建设的一次考验。首先看是否有建设差异化影院的诚意与决心;二是电影文化对落实丰富少年儿童文化生活、关心儿童健康成长是否有业内的具体行动;三是在考虑院线利益的时候,切勿不要急功近利。万事开头难,坚持才是胜利。央视的科技频道,创办时没有广告收入,但经过几年的坚守,终于赢得了广泛受众,现在科技频道的广告不比其他频道少。“品质源于坚持”,这话千真万确。

孩子的童年,如果没有电影的陪伴,将是童年记忆的一大遗憾,况且电影文化对孩子们品德素养、艺术鉴赏、文学想象、审美情趣的培育都至关重要。



由中国美协、关山月美术馆、广东省美协、广州美术学院、广东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主办的“岁月悠悠——陈章绩中国画卷”近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。展览展示了陈章绩历年创作的花鸟、山水、人物等题材的中国画精品近百幅,创作时间跨度近50年。陈章绩上世纪70年代以《春闹葵乡》《西沙

丽日》成名,在花鸟画和山水画创作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。画家不仅继承了岭南画派的精粹,对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有着深刻理解,而且勇于创新,形成了富有时代气息的艺术风格。(图为陈章绩作品《春闹葵乡》)

(徐健)

北京市作协积极扶持“80后”作家

本报讯 近日,由北京市作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《西洲曲》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。白桦、陈晓明、孟繁华、贺绍俊、宁肯、邱华栋、徐坤等20余位评论家、作家齐聚一堂,共同交流了对这部作品的看法。这也是北京市作协首次为“80后”作家举办研讨会。

《西洲曲》以主人公“石壶”为叙述者,采用回忆的叙事手法,不断穿插于石门、南棉两点之间,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普通的一家人面对计划生育这一政策的命运遭际。在处理这个主题时,作者郑小驴选择了一种更为直接的视角,他将人物置于整个时代之中,通过描写主人公精神、情感的成长过程及所经历的阵痛,折射这一时期的社会与环境之变,

展示出作家的人文关怀精神和批判意识。

与会者认为,郑小驴对小说叙事的理解、文字的老到和整体掌控小说节奏的能力,都值得肯定。小说虽涉及计划生育的政策,但在作家在写作中只是将其作为整个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,其整体上还是属于成长小说。此外,小说具有一种特殊的抒情色彩,并呈现出一种恐惧、焦虑、绝望、不安的精神气质。

北京市作协秘书长王升山表示,北京市作协今后将为更多年轻作家举办研讨会。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也表示,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更加关注和积极支持“70后”、“80后”作家的作品。

(行超)

作家走进宁都看老区新貌

本报讯 一提到江西赣州宁都县,很多人会自然地联想起中央苏区、革命根据地。进入新世纪,宁都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,革命老区正呈现出崭新的面貌。近日,由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率队的“中国作家看宁都”采风创作团一行13人走进宁都,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采风创作活动。活动中,作家们先后深入到宁都县的田埠、黄

石、小布、黄陂、东山坝等乡镇及革命地旧址进行参观考察,感受宁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和“客家祖地、文乡诗国、苏区摇篮、赣南粮仓”的历史文化底蕴,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。

采风期间,作家们还参观了新成立的宁都文学院。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向宁都县捐赠了25000册、价值70余万元的图书。(刘 颖)

新书贴

《白口罩》
须一瓜 著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2013年11月出版

明城开发区突发疑似流感疫情,民众一片恐慌,满城尽戴白口罩。年轻漂亮的女记者小麦临危受命,前往一线采访,但情况的复杂性远远超出她的想象。《白口罩》是一个意义混杂的象征,在新型传染性病毒使全城人心惶惶的时候,白口罩是阻隔病菌的工具,也是胆怯、懦弱心理的流露;是城市危急的信号,也是谣言、谎言的标志。长篇小说《白口罩》探究了极端情境下的复杂人性。